

编者按

在我国学术语境下,世界史主要指的是外国史,与中国史是并列的。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学术分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结果是史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推动了史学研究的繁荣。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研究对象、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甚至壁垒。如何认识这种学科壁垒或差异?怎样打通?围绕上述问题,本版邀请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者分别写作文章进行探索,以期推动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互动和交融。

# 从史料和理论来认识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异同

□ 黄春高

在我国学术界,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差异,在习惯表达中已显露无遗。对差异的强调,首先源自研究对象,进而推及至史料、概念、方法等层面。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史为微观研究,世界史为宏观研究;中国史重史料和考据,世界史重问题与思辨;甚至将中国史简化为实证研究,世界史简化为理论研究。这种认识显然存在着偏差,而出现这种有偏差的认识,肯綮在于对世界史与中国史在史料和理论的认识与把握上有偏见。

世界史学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后才真正形成和建立。在兴起之初,除了具体的对象研究之外,多探讨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兴衰等规律性的内容,因而素有重视理论的传统,体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范畴之中。

但重视理论并非就轻视史料。从学科建立之初,世界史的学人们就为史料建设做着艰辛的努力。在20世纪50-60年代,诸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都有正式或者非正式出版印刷的世界史史料集,力图为世界史学科打下扎实的史料基础。然而,由于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隔阂,对对象国史料的熟悉和掌握往往存在困难,以至于人们只能以有限的、零碎的、非主导性的史料开展研究,甚至造成了一种

非史料性的理论支配的历史叙事现象。这是时代的局限和特征,同时也是世界史学科兴起过程中所必经的努力和尝试阶段。

晚近以来,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世界史在史料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在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领域,购买各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材料、出版文献以及研究著作,已经成为学者个人和学术群体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依据原始史料展开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喜人。例如,在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领域,对原始史料的使用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系统或者非系统性地购进外国出版的原始史料,以及出版物和手抄本的电子化,既对学者们的语言能力,如亚述文、埃及文、赫梯文、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中古法语、中古英语、中古德语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一些学者由此脱颖而出,能够利用出版的一手史料乃至手抄本进行史学研究。概而言之,国内的世界史研究,已经走向以原始史料为主导的新阶段。

国内的中国史研究,所呈现的史料支配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许多具有创见和革命性的史学研究,是在理论指导与运用下取得的,如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做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海外汉学家,体现其成绩的,也是运用相关的理论。诸如明清经济内卷说、大分流说,冲击-反应说等汉学理论成果,激发了学者们更多关于历史理论的思考,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成果。例如,以科层理论来解释中国官僚制度,以信息理论来解释宋代国家治理,以长时段理论来解释中国乡村,以心态史理论来解释清代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以医疗社会史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身体、社会和书写等,这些都是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中的突出体现。

中国史对理论的重视,正如世界史对理论的运用,预示着各自学科的变化和发展。正是在这里,二者之间有了趋同的可能。更准确地说,有了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可能。中国史学家可以对世界史研究中所涉及的体现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理论方法做更多了解,以此推动中国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样地,诸如版本目录学、文书学、碑铭学、档案学、简帛学、地方志等诸多体现史料功夫的学问,都值得世界史学者学习和借鉴。胡应麟、梁启超等人的史料辨伪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法,陈寅恪的“诗文史法”,陈垣的校勘四法,钱锺书的专精博通法,黄侃的考据史三昧等,都有助于世界史学者提

机会与中国学界交流,也对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产生兴趣。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古典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丰富的文献记录和物质遗存,同时其文明传统以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的世界。这些记录不仅包括书记载,还包括大量的文学、哲学、医学、地理学、礼仪、律法等不同方面的资料。如此,学者们不仅可以比较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这两个古代文明,也使得两者的比较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按理说,中国学者也应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感兴趣,而且应该在这一比较研究领域扮演重要甚至引领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学者拥有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理学、更加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西方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唯一古代文明,其他古代文明也被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明不再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其他古代文明获得了和它同等的地位,因而是可以比较的。

当然,西方古典学界对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的兴趣,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入,使得西方古典学者有

域内的细小问题精耕细作,不愿研究视域更开阔、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开展文明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克服过度专门化的问题,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壁垒,促进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诚如穆启乐和谢德尔所说,中国学者依托中国古代文明的知识,能够就世界文明中的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实际上,我国学者业已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林志纯先生和代表性学者刘家驹先生均提倡并躬行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前者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1997年),后者著《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比较》(1995年),成为国内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开拓之作。只不过当时囿于语言和交流条件的限制,这些前辈学者未能和西方学者就比较研究展开交流。晚近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逐步密切,我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出版和发表,如蒲慕州著《文明的敌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壮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5年)、周铁群著《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节日、宴会与性别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吴晓群著《希腊古风 and 古典时代与中国先秦的哀悼仪式》(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18年)等。这说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比较研究成果很感兴趣。然而像上述这样的尝试还很少,且研究者主要来自世界古代史领域。在我国,如果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到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来,将为我们历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比较研究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探视不同古代文明,从而更清晰地了解各自的特征。比如在《道与言: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中,劳埃德和汉学家席

域内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古代希腊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主导方式是寻求根基,弄清证明过程,推导出无可置疑的命题,其优点在于对逻辑明晰和推理严密性的追求,其弱点则是妨碍共识,对所有先入之见都持怀疑态度。而古代中国人的主要方法则是寻找和探索一致性、呼应性,相互关联性。这有助于将不同的探究领域联系起来,形成整体概念,其弱点则是难以产生与主导性立场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理论性和框架性创新。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德国一些眼光开阔的学者——包括韦伯在内——注意到了不同世界古代文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取得的思想突破。在此基础上,雅斯贝斯在1949年提炼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总结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人类历史的显著特征。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概念仍然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我们把握世界古代文明特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如若缺乏比较视野,这样的创新是不可想象的。

从更高的层面来说,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进一步繁荣发展和复兴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虽然人们倾向于把不同古代文明和特定的现代国家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人类的古代文明并非少数国家所独占,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也因为如此,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高的学术研究领域。总之,开展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从源头上对中国文明和文化传统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古代文明的精华,并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直接或者间接使用西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很有可能会被西方模式所左右,丧失了解自己历史的能力。因此,我们自己必须有理解和认识历史的范式,否则就会为西方中心论所支配。

要摆脱西方模式的支配,需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范式。只有这样,中国史和世界史才能够拥有自身的根基。事实上,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学术生长的历程充分证明,我们的学术研究早已有了正确的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著名的历史学“五朵金花”所关注和研究的理论,诸如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与国家等主题,不仅中国史学者参与其中,世界史学者同样极其关注并作过积极贡献。世界史和中国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不同的历史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问题。因此,中国的世界史与中国史研究,在史料和理论上或许有不同的起始路径,但最终都走向了史料与理论的结合。这一“殊途同归”的历史提醒我们,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基础,更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提炼出新主题、新观念和新方法。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能起到某种杠杆和基础性支撑作用。

在古代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有限,但国际视野的具备,仍有助于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国别史研究者丰富认知视角,增强分析问题的层次和深度。地理大发现之后,西力东渐,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不断加大,这就决定了跨国语言材料和认知资源的使用在中国史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对于认知和把握这一阶段的中外互动历史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融合,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和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面向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具有全球或世界视野的中国史研究,也更为需要体现中国影响和因素、渗透中国关切和情怀的世界史研究,而这将是两个学科彼此融合的理想结果。

在追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加强中外史学界多学科的多维对话与交流,必须得到格外的重视。因为研究学必会遇到经济全球化意识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矛盾问题,要面对各自视野的国际化程度及对对中国了解深度不平衡的矛盾问题,势必受到诸如“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之类认知模式的困扰。笔者以为,强化中外学者有关研究的深度对话和交流,是中外历史研究得以会通的重要途径。就中国史研究而言,以往我们的交流很重视“走出去”,如今,或许更应当重视“请进来”:既要请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和学生来中国交流、学习,也要请一流的西方史和世界史学者来交流、对话,同时还应该独特问题意识的学科交叉教研团队,鼓励有条件的教师积极开设跨学科课程,吸收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研究生共同参与课题研究,多进行融合性的研讨式教学,从而在实践研究和教学中养成跨国认知、跨学科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在这之外,生态学、医疗社会学、数字人文和公共史学等领域已做出可贵探索、走在前列,但还需加大力度。就学科融合不足的现状而言,甚至不妨辅助一点必要的跨学科选课规定,给予研究生一定的跨学科制度性引导。目前,历史学门类的三个一级学科评议组是分立的,在探讨研究生教育如何跨学科融合问题上,可以通过建立三个一级学科评议组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来进行,以切实加

强体制化的组织保障。

再次,在当今,史学界欲推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融合,一个重要的支点和基础,当是大力发展中外古史比较、古代中外交通史和近世以来的中外接触、碰撞和交流史研究,尤其是近世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中西互动史研究。这些研究的强化和深化本身,将成为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融合最好的融合剂。笔者曾经指出,“明确提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自觉的努力目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历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历史研究者在新时期的学术自觉。”而在努力阶段,要做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

关于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会通融合,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历史学的大视野观照、长时段把握和国际化导向,必然内在地发出这样的要求。记得2004年的时候,史学前辈李文海先生就曾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打破分割、促进融合》(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5期),他对当时历史学八个二级学科(包括世界史和考古学在内)各自为营的现象,表示出深切的忧虑,并从促进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角度,呼吁各二级学科之间理当自觉地进行会通融合。

2011年,历史学分成如今并立的三个一级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这当然有助于世界史和考古学目前的发展,体量过小的世界史学科的确制约中外历史研究和教育的会通融合水平。但同时也应看到,2011年以来,由于三科分离而激发的历史学内各学科彼此会通融合的渴望与呼声,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愈加强烈了。2014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在西北大学专门召开“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主题研讨会,便是对此一诉求的积极回应。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一会议,至今仍对三个一级学科的与会学者就此达成的共识记忆犹新。2020年,《历史研究》杂志也曾就此问题发表多篇专题笔谈,学者们围绕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不同历史问题的内在逻辑和固本强基、创新发展的学科内驱等多种角度,深刻说明了历史学门类下各学科会通融合的必要、可能与前景。笔者以为,目前,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融合其实不需要更多的学理论证,应该深入考虑的是如何在制度层面对其加以保证,如何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推进。

首先,历史学科内在的融合发展要求,必须在高校的本科教育体制中得到明确体现和强化保障。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本科教育,都不能两相割裂。世界史的本科教育,正如学者们所强调的:“不能是‘世界史加外语’”,理当充实有关中国历史影响以及中外历史互动的教育内容,体现中国人的关切和情怀;而中国史的本科教育,也应该自觉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中,保证学生能掌握较为充分的世界史知识。中国史和世界史本科教育的两相贯通,是培育学生爱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需要,也是加强史学人才培养的基础,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日常熏陶中,都应加强对此一要求的自觉贯彻。长期以来,历史教育界对此本无分歧,但近些年,由于学科分离等诸多原因,在有的高校此种学科融合反而出现相对弱化趋势,需要有所警觉。目前,教育部设立的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没有分化成三个一级学科各自的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对于历史本科教育的一体化贯通要求来说,是十分明智的。至于在课程设计中,究竟怎样兼顾,如何保证科学的交互课程比例,除了通史主干课程外,尚应有何种配套课程,都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考量。在这方面,历史学三科一体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当能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研究生教育层面,如何培养学生具备贯通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视野、资料获取与问题意识的研究能力也需引起重视。高层次史学人才的造就离不开打破学科界限,按照新要求建设的要求,适当组建一些具有独特问题意识的学科交叉教研团队,鼓励有条件的教师积极开设跨学科课程,吸收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研究生共同参与课题研究,多进行融合性的研讨式教学,从而在实践研究和教学中养成跨国认知、跨学科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在这之外,生态学、医疗社会学、数字人文和公共史学等领域已做出可贵探索、走在前列,但还需加大力度。就学科融合不足的现状而言,甚至不妨辅助一点必要的跨学科选课规定,给予研究生一定的跨学科制度性引导。目前,历史学门类的三个一级学科评议组是分立的,在探讨研究生教育如何跨学科融合问题上,可以通过建立三个一级学科评议组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来进行,以切实加

强体制化的组织保障。

再次,在当今,史学界欲推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融合,一个重要的支点和基础,当是大力发展中外古史比较、古代中外交通史和近世以来的中外接触、碰撞和交流史研究,尤其是近世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中西互动史研究。这些研究的强化和深化本身,将成为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融合最好的融合剂。笔者曾经指出,“明确提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自觉的努力目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历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历史研究者在新时期的学术自觉。”而在努力阶段,要做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

(作者系中国人大历史学院教授)

## 推进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融合发展的思考

□ 黄兴涛

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能起到某种杠杆和基础性支撑作用。

在古代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有限,但国际视野的具备,仍有助于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国别史研究者丰富认知视角,增强分析问题的层次和深度。地理大发现之后,西力东渐,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不断加大,这就决定了跨国语言材料和认知资源的使用在中国史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对于认知和把握这一阶段的中外互动历史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融合,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和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面向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具有全球或世界视野的中国史研究,也更为需要体现中国影响和因素、渗透中国关切和情怀的世界史研究,而这将是两个学科彼此融合的理想结果。

在追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加强中外史学界多学科的多维对话与交流,必须得到格外的重视。因为研究学必会遇到经济全球化意识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矛盾问题,要面对各自视野的国际化程度及对对中国了解深度不平衡的矛盾问题,势必受到诸如“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之类认知模式的困扰。笔者以为,强化中外学者有关研究的深度对话和交流,是中外历史研究得以会通的重要途径。就中国史研究而言,以往我们的交流很重视“走出去”,如今,或许更应当重视“请进来”:既要请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和学生来中国交流、学习,也要请一流的西方史和世界史学者来交流、对话,同时还应该独特问题意识的学科交叉教研团队,鼓励有条件的教师积极开设跨学科课程,吸收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研究生共同参与课题研究,多进行融合性的研讨式教学,从而在实践研究和教学中养成跨国认知、跨学科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在这之外,生态学、医疗社会学、数字人文和公共史学等领域已做出可贵探索、走在前列,但还需加大力度。就学科融合不足的现状而言,甚至不妨辅助一点必要的跨学科选课规定,给予研究生一定的跨学科制度性引导。目前,历史学门类的三个一级学科评议组是分立的,在探讨研究生教育如何跨学科融合问题上,可以通过建立三个一级学科评议组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来进行,以切实加

强体制化的组织保障。

再次,在当今,史学界欲推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融合,一个重要的支点和基础,当是大力发展中外古史比较、古代中外交通史和近世以来的中外接触、碰撞和交流史研究,尤其是近世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中西互动史研究。这些研究的强化和深化本身,将成为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融合最好的融合剂。笔者曾经指出,“明确提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自觉的努力目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历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历史研究者在新时期的学术自觉。”而在努力阶段,要做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从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探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

□ 黄洋

近30年来,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甚至成为热点。虽然也有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者参与其中,但主要的推动力量似乎来自自希腊罗马文明研究为本业的西方古典学者。英国剑桥大学的杰弗里·劳埃德爵士在投身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之前,已是国际著名的古希腊科学史专家。1987年,他在北京大学访问研究时期,开始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产生兴趣,之后转向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成为这一领域卓有建树的开拓者。从1996年起,他接连出版四部关于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医学以及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杰弗里·劳埃德只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其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古典学者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产生兴趣。

西方古典学界的这一新动向值得关注,也需要解释。自启蒙运动以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就一直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和“奠基神话”。因此,在18世纪,当现代西方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兴起之时,它就承载了一个特别的使命,那就是阐述现代西方文明的这一“奠基神话”,从解

释西方古典文明亦即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性来彰显现代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也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置于高于其他古代文明的优越地位(西文“古典”一词的拉丁文词根即有“第一等”之意)。此外,传统上西方古典学者仅将古希腊罗马文明纳入历史考察的范围。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冲击、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尖锐批评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因素,促使西方古典学界反思其出发点和立场。一方面,西方古典学家们不再把古希腊罗马文明全然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神话,更加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西方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唯一古代文明,其他古代文明也被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明不再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其他古代文明获得了和它同等的地位,因而是可以比较的。

当然,西方古典学界对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的兴趣,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入,使得西方古典学者有

域内的细小问题精耕细作,不愿研究视域更开阔、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开展文明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克服过度专门化的问题,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壁垒,促进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诚如穆启乐和谢德尔所说,中国学者依托中国古代文明的知识,能够就世界文明中的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实际上,我国学者业已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林志纯先生和代表性学者刘家驹先生均提倡并躬行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前者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1997年),后者著《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比较》(1995年),成为国内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开拓之作。只不过当时囿于语言和交流条件的限制,这些前辈学者未能和西方学者就比较研究展开交流。晚近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逐步密切,我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出版和发表,如蒲慕州著《文明的敌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壮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5年)、周铁群著《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节日、宴会与性别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吴晓群著《希腊古风 and 古典时代与中国先秦的哀悼仪式》(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18年)等。这说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比较研究成果很感兴趣。然而像上述这样的尝试还很少,且研究者主要来自世界古代史领域。在我国,如果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到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来,将为我们历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比较研究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探视不同古代文明,从而更清晰地了解各自的特征。比如在《道与言: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中,劳埃德和汉学家席

# 世界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



扫描二维码  
查看世界史版更多内容